

周世倫導演採訪記錄

周先生於 2018 年 5 月 16 日訪問了德國波鴻魯爾大學東亞學學部，先跟學生一起看他的作品《暴民》的片段，然後回答學生的提問。

問: 周導, 您為什麼決定拍攝這樣的紀錄片？

周世倫: 我拍攝的形式其實非常多元。我最出名的兩部片子算是「太陽，不遠」和「暴民」，所以大家都以為我是一個專注政治題議題的導演。但是其實我在臺灣也做戲劇和廣告 CF 拍攝。

我最早拍的一部紀錄片片名叫做「天使」，記錄一所學校的特殊教育。第二部紀錄片叫做「河」。記錄當時桃園的阿美族河岸部落（撒烏瓦滋部落）原住民被強迫遷移的事件。第三部紀錄片叫做「神選者的道路」。記錄我的父親追隨上帝的信仰過程。第四部紀錄片大概就是大家熟知的「太陽，不遠」。這是與十個導演共同創作的作品，記錄太陽花學運。第五部紀錄片就是今天各位看的「暴民」。它其實在探討，學運的學生到底是暴民，還是懷抱著理想對抗體制的理想主義者。第六部紀錄片是「希望」，記錄一個非常重要的台灣原住民兒童合唱團。第七部作品片名是「迴家」。它其實是關於台灣原住民族的土地轉型正義。於此同時我其實正在規劃要拍攝一部劇情片。它是有關性別平權議題的藝術電影，預計 2020 年上映。

不過回歸到剛剛這位同學的問題：為什麼會做這樣的一部紀錄片？我想，其實最主要是因為，「太陽，不遠」記錄的觀點，大部分集中在這個活動的議題上面。而我們期待「暴民」帶領大家看到更多的當代的年輕人，他們對政治的想法跟轉變。

問: 您在政治上很積極嗎？您在臺灣經常參加遊行示威活動嗎？

周世倫: 這個問題我昨天想了一整個晚上。我第一次站上街頭，是我的父親帶領我去參加一個活動，出發之前我並不知道那是一個什麼樣的活動。

那一年是 1979 年「美麗島」事件，當時我才十一歲。第一次站上街頭，最重要的學習是，父親帶給我這一生從來不會改變的價值觀，就是人人生而平等，人權天賦這樣的概念。政府的權利應該從人民而來，沒有任何一個政府

可以擁有奴役人民，控制人民自由跟言論的權利。那一個夜晚，我很難過，哭得很淒慘。因為催淚彈真的厲害。

我現在接下來要講的是，我第一次參加暴力衝突事件，那是在 1988 年的台灣的 520 農民運動。

這麼多年來，我經常站上街頭跟著大家一起抗爭。但我想，我不能算是一個積極的政治參與者，因為我對政治並沒有高度的野心跟權力慾望。更多時候，參與這些抗爭，是為了實現我對身為一個基督徒的自我要求，跟實踐基督教義的貫徹。

問: 您在國外的時候參加過遊行示威活動嗎？如果您參加過的話，您認為和台灣的遊行示威活動相比，國外的有什麼不同？

周世倫: 我想我必須承認，台灣的民主跟自由的進程遠遠落後西方民主社會五十年。

我第一次到德國的時候去了柏林。我看到就是很多人準備要上街遊行。於是我很興奮得跟我的伙伴說希望他帶我去參加。然後那個伙伴很不屑的看著我說，這是「Tea Party」。意思是說，那是一個不會有任何激烈抗爭衝突的遊行，所以對他們來說，他寧願去喝下午茶也不願意去參加。他告訴我，通常德國真正的示威遊行，基本條件要先燒掉兩台汽車。[大家笑] 如果有機會，我倒是很想參與。

問: 周導, 您為什麼把您的電影取名為「暴民」？

周世倫: 這其實是一個視覺設計上的小詭計。當時的政治媒體，支持政府的媒體，他們通常希望用「暴民」這兩個字來型塑學生的遊行運動，或者是抗爭運動，然後希望能夠降低他們在政治上的影響力。不過，我們通常這樣理解，這些都是支持統治者而產生的政治想像。他們這樣做，其實是為了支持執政者，所以產生了很多政治想像，常用「暴民」這兩個字來形容這些公民。

所以，我們嘗試在視覺設計上做一個試驗：我在中文使用「暴民」這兩個字，順應了媒體的說法，但是在英文的部分，我們則嚐試使用「覺醒中的公民」來註解「暴民」這兩個字。希望藉由這個設計，讓「暴民」這兩個字產生一個反義的重新定義。所以其實，我們希望用視覺設計引導大家重新去思考，抗爭的覺醒公民跟「暴民」的不同。

問: 我們發現，您選擇了和紀錄片「太陽不遠」中同樣的角色。您是如何挑選劇中的角色的？

周世倫: 第一個，「太陽，不遠」是一部在台灣是非常知名，觀賞率很高的一部紀錄片。「世代正義與藍綠之爭」的那個片段裡面，其實很多人物出現過。我們覺得，可以帶領大家更深入得認識這些人。第二個事情是，我們在電影裡可以省去很多時間來重新介紹他們的出身。所以當時的確希望能有一些承襲『太陽～不遠』的脈絡，畢竟，重投介紹每一個人會花去很多時間。

問: 您為什麼主要採訪了女性？您是否想強調，很多女性也參加示威遊行？

周世倫: 「暴民」的片子裡面大概一共有十位受訪者（其中女性角色的確過半）。但我其實想提醒各位的是，冠華在「反課綱」事件裡面，選擇犧牲他的生命來重新燃燒運動的動能。

所以在製作會議上，我們的整個製作小組，其實有很多的討論。某種程度，我們覺得「反課綱」是「太陽花學運」延伸下來非常重要的一個進程。但是另外一個層次，冠華已經離開人世，我們到底怎麼忠於他自己想要說出的事實，這件事情讓我們非常困惑。所以經過，大概一個禮拜不斷的討論，最後我們達成的協議是：如果不從導演口述的觀點來看待這個事情，最好的方法就是邀請他的母親。所以「暴民」是一個嚴肅的政治議題式的紀錄片，對我們來說，性別不是考慮的重點。通常我們更關切是，這個人物的代表性是不是充分而且足夠。

問: 但是女性在片中出現的比男性多。

周世倫: 比如說，你們看到的第一個出現的人物——小小，她其實代表一個對政治完全懵懂無知的覺醒者。318 發生的晚上，她本來在便利商店買茶葉蛋。她的學長騎著摩托車來買了一包香煙，然後跟她說衝進立法院了，你不要來。小小當時很興奮，她說衝阿衝阿衝阿，我也要去。沒有想到，從那一個晚上開始，就改變了她整個人生，也改變了她對政治的看法。

另外一個我們覺得值得觀察的部分是柏瑋跟哲成。他們兩個代表的是深藍鐵票重新對社會運動的覺醒跟認知。甚至我們運用了哲成父親對他的轉變的看法來說明。就是我們所謂的 1945 年漢移民的第二代，如何重新建

造他們對政治的看法。所以拍攝這兩個代表性的人物，其實想要塑造跟說明的，就是新一代的漢移民到台灣之後本土化的進程。

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布農族女孩 Savungaz。我不能特別強調她的性別，因為她在台灣是非常重視性別平權的人。Savungaz 代表的是，台灣對原住民族過去的歧視，跟未來我們對原住民族轉型正義的期待。Savungaz 是「美麗灣」抗爭事件非常重要的代表性的人物。她在台灣留下一個非常經典的名句：環境評估本來是希望，它能夠降低人為開發跟商業開發對大自然環境造成的傷害。不過一個房子蓋好了之後，還要重新做一次環境評估，當然它的用意只有一種，就是政府要對他自己的違法事項做補充認證。

同時在那個時間點，大概就是張志軍跟陳雲林陸續拜訪台灣的時候我在這裡要探討的不是政治議題，而是對文化的認知。原住民族有自己的祭祀儀式與文化，他們對此非常重視，它不是一般的表演。台灣負責接待來訪的官員，顯然有點 stupid。他們把原住民族的祭祀儀式當成藝術表演，帶著從中國來參訪的官員進入到他們的祭祀儀式裡面，並且破壞了整個祭祀的進行。所以當時，台灣原住民族的年輕人對這件事情非常生氣，也對中國官員產生了相當的敵意。他們不斷的討論，怎麼用更和平的手段解決這個爭議。所以後來，他們就決定發起了一個運動，就是剛剛各位看到的「觀光觀光局」。那個活動其實策略非常有效。他在提醒漢人，如果有一天大家任意打開你的門，到你的客廳去觀光你的生活，你到底會有什麼樣的感覺跟回應。從那次以後，觀光局就命令各級縣市政府不可以再辦類似的活動。

另外一位人物是曾柏瑜，她跟少馳都是年輕的世代裡面後來決定參與政治選舉的人。尤其柏瑜，曾經是太陽花的媒體發言人。同時他們堅持認為，選舉應該將所有的帳目公開，用最低的成本嘗試著爭取人民的信任，並且能夠選上那個職位。

最後我想提一個特別的代表性人物，就是大家最後看到的，做各種不同 cosplay 的品妤。品妤某種程度代表的是台灣所謂的「潮」世代就是流行風潮的這個「潮」，以及「潮時代」的年輕人對政治參與的看法跟態度。品妤同時是目前台灣性別平權非常重要的一個代表性人物。她個人看起來非

常的女性化。但其實她的個性非常的剛強。她在修法律學位之外，也修社工學位。因為她希望，未來能夠在婚姻暴力這一女性議題上面努力。

不管如何，其實我們希望藉由「暴民」讓大家看見新一代台灣人對面對政治的態度。

在許多台灣的老一輩的政治人物，甚至是學者認為，學生是迷失的世代的當下。我們嘗試藉由「暴民」說明，他們不是傳統政治思維的迷失者，而是新的政治視野的發現者。

問: 台灣的很多電影院拒絕放映「暴民」這部紀錄片。您認為，為什麼會這樣？您對此會繼續做哪些努力？

周世倫: 台灣過去 10 年來，所有的藝術工作者都要面對同樣的一個問題：不管你是藝術工作者或者你是發行企業，不管你在藝術的任何一個環節，只要你被貼上「台獨」這兩個字，你就會在台灣完全活不下去。所以不管你是誰，你都會盡量避免去碰觸台獨這個議題。只有在民調的時候，我們才看得出來支持「台獨」的到底有多少人。戲院跟發行商通常同時在中國也有很大的事業體系，所以他們難免會自我審查。

至於自己可以做哪些努力嗎？我想我會向李惠仁導演看齊。在招募資金的方式這部分，我們允許大量的捐贈者用「無名氏」這三個字。所以你會發現，現在台灣最多人使用的名字叫做「無名氏」。我們藉由這樣的方式，以最低的成本跟最低的需求，來完成在我們心中更偉大的作品。同時我們嘗試著學習，把「票房」跟「賣座」這兩個字，從我們的字典裡面拿掉。未來作品都會在網路上免費給大家看。我把紀錄片導演這樣的工作當成一個牧師或者是神父，而他工作的目的就是達成宣揚教義的目的。

問: 在拍「太陽不遠」和「暴民」這兩部電影的過程當中，有哪些事情讓您特別難忘？

周世倫: 因為我的出生背景，其實我是一個非常重視家庭價值的人。很多時候當我在看德國的紀錄片的時候，我不得不佩服 1968 年那些學運學生的家長他們的偉大。因為在「太陽花學運」跟「反課綱」的期間，其實有很多孩子被家裡驅趕出來，他們必須露宿街頭。家長會把家裡的鎖換掉，不讓他們

回家，會把他們的賬戶結清，讓他們再也沒有資金可以運用，會停掉他們信用卡。我其實不了解，為什麼會有父母把孩子逼上這樣的絕境。

我想我雖然是一個記錄片的導演，但是我有責任解決我看見的社會問題。所以那段時間是我最痛苦的時期。因為我必須同時解決許多學生在生存上的困難。這樣四年過去了，到今年 2018，到目前為止大概只剩下一個學生還沒有辦法回家。可是請大家放心，我們幫他申請了學校，幫他申請獎了學金。他現在很好，住在宿舍裡面。

但我比較期待，在座非常年輕的各位，總有一天，萬一你們遇到這樣的狀況，要與孩子溝通，不要把他踢出去。不要讓問題離開你的家庭，然後變成社會問題。

問: 您為了台灣的未來和未來的發展有什麼希望？

周世倫: 正如我剛剛說，我認為台灣的民主進程遠遠落於後西方民主社會將近 50 年。儘管一個世代又一個世代不斷的努力，不斷的用思想跟身體與執政者衝撞，但是進步的速度永遠如此緩慢。基於這樣的理由，我自己也經常在想，當中國不斷的提出希望兩岸統一，那麼兩岸統一比較可能達成的條件，到底是什麼？什麼才能讓台灣人欣然接受統一？我很難有一個具體的答案，但我覺得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容易達成的條件。就是，中國放棄一黨專政的集權體制，同時共產黨員必須放棄他們龐大利益共犯結構的體制，還給中國的人民民主自由跟天賦的人權。可是這畢竟只是台灣人的想像，這個太難達成了。台灣整整努力了 60 年，才有那麼一點點的進度與成就。我想很難說服台灣人和大陸統一，因為如果統一，必然要再退回原點。

馬英九政府不斷的說，台灣「天然獨」的比例越來越高是因為教材被陳水扁變更了。但我覺得，那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重要的還是因為，台灣人開始知道什麼是自由，什麼是民主，什麼是人權。當你享受過這些權利之後，很難要你再放棄這些。所以我想應該這麼說，台灣人追求台灣獨立最大的一個因素，其實是因為希望保護我們曾經努力過、盡力爭取到的民主跟自由。所以我想，盡全力的進一步追趕西方民主國家的民主進程，是台灣要不斷努力的方向。但是眼前看起來，追求獨立，似乎是台灣人民唯一能夠走的路。